一

我是大别山的儿子

放 牛 娃 子

1916 年 5 月，我出生在大别山腹地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里。

李家洼属河南省新县柴山堡地区，四面环山，村南山势稍缓，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。村子很小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大都是穷人。我的家靠村西头，只有一间房，屋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，院子一角有一棵大樟树。

我的祖父李定祥，祖母郭氏，生有李家宽、李家裕、李家直、李家信 4 个儿子。我父亲李家裕排行第二，成年后，分家自谋生计。我们家里没有水田，父亲在山脚林边开点荒地，种点杂粮，不够养家锄口。母亲崔氏生我之后，一直病魔缠身，无钱医治，我刚

9岁，她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，那时她才 30 多岁。

在我 7 岁的时候，父母亲让我拜师学裁缝，是想让我学点手艺，好挑起养家的担子。在当时，学裁缝算一门手艺，比起干农活来要轻松得多，也能多挣几个铜钱。可是，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干了。我觉得整天闷在屋里，给师傅干家务活，什么也学不到手，就和父母亲商量，不当裁缝，要去放牛。尽管放牛很苦，但比较适合我的性格。

那时，未成年人给人家放牛只给饭吃，不给工钱，是真正的“混口饭吃”。我们家只有 3 口人，按理说是不会让一个 8 岁的独生子给人放牛的，可是家里实在难以度日，儿子能在外边混口饭吃，父母也感到是一种解脱和安慰。

回想起来，放牛的生活非常苦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得在山上、林间、草地、溪畔，东奔西跑，日晒雨淋，蚊叮蛇咬，还时刻担心牛跑丢了。我是给叔叔家放牛，他家既不是地主，也不是富农，只是家境比我们好一些。婶子很厉害，对我很刻薄，经常给我吃剩饭，还不让吃饱。每天放牛回来，她都要看一看牛吃饱没有，如果她认为牛没有吃饱，就说：牛没有吃饱，你也不能吃饱。让我饿肚子。

放牛虽苦，但苦中有乐。我有几个要好的牧友，每天天刚亮一起喊着放牛号子出去，太阳落山才回

家。在野外，大家谈天说地，舞棒弄棍，捉虫抓鸟，游水爬树，开心地戏耍。有时也搞一点恶作剧。村里有个老头，是个老光棍，脾气很怪，好骂人，我们10几个放牛娃，他见谁骂谁，骂起来没完没了，有时还咬牙切齿，用菜刀剁着猪草骂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几个人商量好去治治他，到他房子后面的高坎上，往他屋里扔石头，气得他不得了。

我放牛五六年，牧友间感情很深，久久不忘。有个叫李汝林的，1947年队伍挺进大别山，我顺路回家时见过他。那时我虽然当了旅长，但和他在一起谈的，还是放牛时候的事，仿佛又回到童年的岁月。

我父亲没有上过学，一个大字不识，吃了很多亏，于是他想方设法让我读点书。13岁时，我边放牛边读书，断断续续念了半年。上学地点在李家祠堂里，祠堂旁边有一棵300多年的大银杏树，现在还枝繁叶茂，可算得上是李家洼历史的见证。教书的先生是湖北人，姓什么记不起来了。半年时间，我学了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。后来由于家里生活实在困难，就停学了。这是我一生掌握文化知识的开端和基础。

童子团团长

1928年6月，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柴山堡地区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，后来成为大别山地区第一个最

的革命根据地。

柴山堡革命根据地，位于光山县西南部，东起羚羊山，西到天台山的黄杨寨，北起白沙关，南到台盘山、双门山至湾店，东西南北纵横各有 20 来公里。1924 年，这里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，湖北的黄（安）麻（城）武装暴动，又有力地推动了这里的革命形势发展。黄麻起义曾占领黄安县城 21 天，成立了黄安县苏维埃政府。但由于当时起义部队人枪都处于劣势，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，起义军领导人吴光浩、戴克敏等，不得不率部队撤出黄安县城，北上进入河南境内，先是到了我家乡南部的木城寨，辗转游击于木兰山一带；后来发现柴山堡地区条件更好，于是这支起义部队于 1928 年 6 月进驻了柴山堡。1929 年，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军打到这里， 9 月建立了鄂豫边区特委。后来这里扩大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是鄂豫皖苏维埃的首府，中央鄂豫皖分局也设在新集镇。这里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，苏维埃政权、党团组织、各种群众团体相继成立，童子团也应运而生了。

1929 年，我们村成立了童子团，后来叫儿童团，有 20几个人，我被推举为童子团团长。当时还有一个“牧童工会”，我也参加了。我们虽然是小孩子，有了自己的组织，有了依靠的地方，一夜之间，觉得

自己长大了不少，好像有了力量。

大家推举我当童子团团长，我很高兴，但不知怎么干，后来在苏维埃政府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帮助下，才逐步明确了任务，把工作开展起来。

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，童子团的活动很正规，有袖标，脖子上系根小红领带，人们叫它“赤化带”。人手一根木棍，算是武器。木棍是统一的，有一米二三的样子，一头涂成黑色，一头是红的，操练的时候扛在肩上。我们管这叫“红黑不认人”，意思是谁违犯了苏维埃的法令、规定，都可以用这根木棍教训他。我们都很神气，但又很羡慕守备队。因为守备队比我们更正规，他们是统一发的红缨枪，相当自卫军，也叫赤卫队，组织纪律很严，集体吃住，和部队一样执行战斗任务，我们童子团也想和红军一样去打仗。

童子团听苏维埃的指挥，主要是站岗放哨，盘查行人，砸庙子，搞游行。

搞游行是经常的事。大家排着队，把“红黑不认人”的木棍扛在肩上，手里拿着三角小彩旗，呼喊着苏维埃规定的口号，如：“打倒蒋介石”，“打倒汪精卫”，“打倒张发奎”，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等等。这些口号在根据地内叫得很响，我们已经懂得，不打倒国民党，不打倒土豪劣绅，穷人就不能翻身。游行中，我

们也搞一些宣传，比如，为了分化敌人的力量，也喊一些非常策略的口号：“为绅不劣者不杀”，“有土不豪者不打”，等等。这种做法，可以使一些中小地主保持中立，削弱敌人的力量。我们也学会了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歌谣，使宣传更有感染力、号召力，增强宣传效果。比如：

土豪是个鳖，农民是块铁，
要打共产党，除非天来灭，
农友一条心，革命无不胜，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那时我们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谁敢说红军不好，谁敢说苏维埃的坏话，我们是不能放过他的，那可真是“红黑不认人”。童子团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大人们也不能不对我们刮目相看。有人说，没想到这些孩子能干这么大的事。加上苏维埃的领导经常表扬我们，影响就更大了。我们自己感到很神气，越干越来劲。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，一下子翻了身，扬眉吐气，成了主人，这不能不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红军主力进驻柴山堡地区后，我的家乡成了国民党反动派“清乡”、“围剿”的重要目标。像什么“罗

李会剿”、“鄂豫会剿”、“徐夏会剿”，还有其他反动地方武装对根据地的进攻和“清乡”。敌人严密封锁，严密控制，实行“清乡”、“会剿”，对共产党、对革命武装力量要斩草除根，残酷镇压，烧杀抢掠什么事都干，也可以说是“三光”政策，抢光、烧光、杀光。我家的房子就被烧了好几次。1928年烧过一次，那时还是瓦房。1929年，全村的房子都被烧光了，半间没剩。到了1930年，没什么烧的了就烧山，所有山上的树都烧光了。他们烧山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红军游击队，让游击队无处藏身。这从反面教育了人民，人民群众对反动派恨极了。

我们这个少年组织，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粉碎敌人的“会剿”和“清乡”，童子团也有一份功劳，除了站岗放哨，盘查行人外，还担负送信、带路、转移群众的任务。我们这些穷孩子，都是土生土长的，放牛、砍柴、玩耍，常年都在山上转，路熟、地形熟。哪里有路，哪里没路；哪里树多，哪里树少；哪座山好上好下，哪座山不好上不好下，熟悉得很，给红军带路从没出过差错。让我们送信也有把握，因为路熟地形熟，送信从不走大路，都是钻树林走山间小路，又隐蔽，又快捷，准确无误。童子团还给红军搞情报，有的反动武装要进攻根据地，我们得到点消息，赶紧向红军报告，起了不小

作用。

那一阵子，根据地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，革命群众的积极性非常之高。可以说，根据地是发展革命力量，保护革命力量的红色堡垒区。一块根据地，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。红军撤出根据地后，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白色恐怖，抢、掠、烧、杀，无恶不作，但根据地的红旗始终没倒。为什么？就是宣传教育的结果。那时红军一进入根据地，就宣传马列主义，宣讲革命道理。有人说，农民没文化，不懂马列主义。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农民没有文化，但阶级觉悟高，容易接受革命道理，更重要的是这些道理，是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武器，他们懂得了、掌握了，就照着去做，就和军阀、地主去斗。那时，人民群众与红军连在了一起，血肉不可分，在根据地内大人小孩都发动起来了，轰轰烈烈闹革命，打倒帝国主义、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，家喻户晓。当时有一支歌子：打倒帝国主义，扫除封建势力，实行土地革命，重新建立无产政权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……这支歌子大人小孩都会唱，响遍了各个根据地。

参 加 红 军

1930 年 2 月，我还不满 14 岁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。

那时，我的家乡已经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为了保证武装斗争的胜利，翻了身的劳苦群众，不仅从物质上大力支援红军，广大青年还踊跃参军，不断充实和扩大红军。

在我当童子团团长时，为红军送信、带路，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。我看到红军里边有不少小兵，强烈向往当一名红军战士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一个本家叔叔讲了。他叫李家辉，是乡共青团支部书记。他文化水平比较高，工作积极，群众威信也高。他学篾匠时的胡师傅当乡苏维埃主席，说话比较管用。那时有了苏维埃政权，参加红军要由苏维埃批准。我和李家辉讲后不长时间，1930 年 2 月的一天，有一个红军营长找乡苏维埃胡主席联系工作，李家辉就当着乡主席的面把我介绍给了红军营长。

红军营长看我小，不想带我走，但听说我当童子团团长，又很喜欢我。他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叫李德生。因为我读书不到半年，那个学名“李发学”一直没有叫开，大人孩子都叫我乳名“德生”，所以营长问我，我就说叫李德生。李德生这个名字也就从参军沿用至今。

红军营长反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，指着他的通信员对我说：你跟他赛跑，你要是赢了他，我就带你

走。我把他的话当真了，就拉着那个通信员去赛跑。通信员把枪递给营长，跟我跑了起来。我从小放牛，爬山跑路不在话下，而通信员背着子弹带不大方便，我很轻松地赢了他。我们跑回来，营长看我那认真的样子，哈哈大笑，乡苏维埃的胡主席也笑了。

笑完了，红军营长问我：“你跑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”

他这一问，我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像有敲什么东西的声音。”

“敲了几下？”

“3下。”

红军营长又问我：“你跑的时候，在路上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？”

这一问，我有点作难，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只是路中间写着两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我说：“是‘红军’吧。”

我说完，营长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好样的。”

乡苏维埃主席也笑着拍了我一下肩膀，说：“合格了。”

红军营长、乡苏维埃主席的话，牢牢地印在我的

脑子里，我立志要当一名合格的红军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，成了一名红军战士，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。

想当红军时怕当不上，心里着急，什么都不考虑；一下子当了红军，就要离开家，又犯难了。我走了，留下父亲一个人怎么办？我要当红军的想法，曾经和父亲讲过，他不反对。可是，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既当爹又当娘，父子相依为命。我走了，他一个人该多么孤单呢！

经过营长的同意，我跑回村里去向父亲道别。当我见到父亲，把当红军的事向他讲了之后，他哭了，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，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只是流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止住泪，拉着我的手说：去吧，孩子，听长官的话，好好干，别记挂我。他这样说，我的心里热乎乎的，也哭了。那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父亲，我们父子俩相对流了一阵子眼泪，就告别了。

两年后有一次部队转移，我们连住进了离我们村不远的八合洼，父亲听说了，特意跑去看我。他看我身体挺好，个子也长高了，很满意。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家里分了田，盖了新房，生活不愁了。这更坚定了我在部队干的决心。我们还说了些家常话，他就回去了。我参军两年，习惯了部队生活，感到除了走

路多一点，部队各方面都比家里好，家庭观念也慢慢地淡化了。父亲来了就来了，走了就走了，不像参军离家时那么难舍难分。哪想到，这一次竟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。

不久，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，撤出了鄂豫皖，敌人占领了我的家乡，我家刚刚盖起来的草房又让敌人烧了。父亲孤身一人，无地无家，靠打工锄口，日子更艰难。他因为是红军家属又受到了牵连，国民党抓“红属”，他只好离开我们村子，东躲西藏，四处游荡，成了无家可归的人，弄得他贫病交加，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，1933 年春，他被国民党军抓去，关进了监牢，等放出来时，身体极其虚弱，肺气肿恶化，家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无以度日，只得拖着虚弱的身子，给人打短工，沿门乞讨，最后惨死他乡，那时他还不到 50 岁。死后，我的本家李发传、李发家两兄弟在乡邻中凑点钱，买口棺木给安葬了。父亲的死讯，是 1947 年部队回到大别山，我回家探望时，邻里告诉我的。我这个当儿子的没尽到孝道，没有答他的养育之恩。

二

徐向前部队的传令兵

红军中的一名小兵

我 1930 年 2 月参加红军，成了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的一名小兵。

刚到部队，班长夏功富告诉我，我们的部队是 3 团 2 营 4 连。后来从历史资料上看到， 1928 年红军进驻我的家乡柴山堡时，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7 军，是由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的。1928 年 7 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 31 师。1930 年初，红 11 军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1 军，下辖 1、2、3 三个师。我所在团是 1 师所属的五个团之一。徐向前同志是我们红 1 军副军长兼红 1 师师长。1931 年，部队有了很大发展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，下面有第 4、第 25 两个军。我所在的部队是第 4 军 11 师 32

团。

刚参军时，我没有枪也没有刀，很着急，空着两只手算什么红军！老兵们对我很好，帮我找干粮袋、被单和衣服，但就是不帮我找枪。有一天，我壮着胆子对一个老兵说，想要一枝枪。他一听就笑了，说：红军战士哪有要枪的，得到敌人手里去夺。你不要着急，等着打仗，打完仗你就有枪了。

正像那个老兵说的一样，没过多久就打了一仗。我因刚到部队，又没有枪，连长叫我到连部去，帮助跑跑腿、送送信。这是我的特长。这一仗打胜了，我们连缴获了几枝枪，都发给了新战士。因为我个子小，连长特意选了一枝最短的断了半截的枪发给我，还给了我 10 发子弹。即使是半截枪，我也很高兴：终于有了一枝枪，真正成了红军战士。

在 4 连刚刚一年，我就被调到营部当通信员，1932 年又调到团部交通排，当上了传令兵。

我们交通排，可以说是指挥员的左膀右臂，是指挥员身边的一支特殊部队。传令兵的主要任务有三项：一是通信，二是警卫，三是参加战斗。因此，对传令兵的挑选是比较严格的，大多是苦大仇深，年轻力壮，有作战经验，勇敢灵活，能够准确领会、传达指挥员的意图的老兵，有的还是班长调上来的。

在交通排，我的年龄最小。但我有个特长，走路

快，善于记路，辨别方向准，不管是大路、小路，还是山路，那怕是穿树林子，只要是走过一次，都能记住，不会出差错。到交通排没多久，排长把我那枝半截枪换成了苏式小马枪。这是排里惟一的一枝小枪，大家都很喜欢它。我年龄小、个子小，就给了我。我得到这枝小马枪，那个高兴劲儿真是难以形容。后来条件好了，交通排人人有手枪、冲锋枪，还有一把大刀，在全团武器是最好的。

当传令兵的责任重大。指挥员的指示、命令要以最快的速度传下去，把下面的战况带回来。作战中传递命令，极少有文字的，大多是口头传达，搞错了，可不得了；作战中传递命令都是紧急的，耽误了时间也不得了，所以一点都不敢马虎。

我记得，1932 年根据地反四次“围剿”刚开始的时候，一次部队从麻城向黄安开进，我奉命到师部报告情况，师长倪志亮让我返回时给 32 团团长林维权传达指示，让他到达指定位置后，立即向师里报告。指示传到了，但林团长没有报告，倪志亮很恼火，立刻把我叫了去，见我劈头就问：

“你把指示传给团长没有？”

我赶忙回答说：“传到了。”

“你传的是什么指示？”

我把他的话背了一遍。

他看我都讲清楚了，没再往下问，就用马鞭子一指说：“你去把林维权给我找来！”

林团长听倪师长找他，不敢怠慢，赶紧跑过去。倪师长问他，为什么到达指定位置不报告，用马鞭子指着林团长的鼻子骂，林团长笔直笔直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不敢说，头上的汗直往下流。

那个年代当传令兵真是不容易。不与敌人交火还好一点，送信、传递命令时间充裕一些，危险性也小些。打起仗来可就不一样了，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来穿去，没有一点胆量，没有灵活机智的头脑，是很难完成任务的。那时送信，信封上都划着“十”字，表示急与缓，一个“十”字是一般的，两个“十”字就是急的，三个“十”字就更急了。遇上有三个“十”字的信，就是有天大的危险也不能耽搁，有时正在吃饭，接到三个“十”字的特急信，放下饭碗就跑，一点不敢马虎。

传令兵也要直接参加战斗。有时有了攻坚任务，兵力不够了，团首长就命令交通排上，像在豆腐甸子、仁和集、葡萄集、潢川、固始、商城、黄安、麻城等等，我都参加了战斗。因为交通排人员整齐，武器好，技术也精，指挥员在关键时刻把它当拳头使用。

在反“围剿”作战期间，我们传令兵干得非常起劲，传达作战命令，递送胜利消息，也直接参加了不

少战斗。有一次打麻城外围的一个据点，叫斗博山，是我们排当突击队。那是 1932 年的 7、8 月间，天气很热，我们冒着酷暑往上冲，很快就把据点里的敌人消灭了。打下据点后，发现河里有敌人的竹排队，正在运送给养，我们又往河里打，消灭了押运给养的敌人，缴获了四五个竹排的白面大米。

我们传令兵还有一个重要作用。在战斗中，有时哪个营的营长牺牲了，或者哪个连的连长牺牲了，就让传令兵顶上去，有的临时代理一下，有的一下子就是正式的了。这说明传令兵的素质是很好的，交通排也是培养干部的地方。

我在 1931 年 2 月参加共青团，1932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，那年才 16 岁。当时入团入党有的一个介绍人就可以，有的则需要俩人。因为我出身贫农，还是牧童工会会员，又当过童子团团长，所以介绍人只是夏功富一个人。

班长夏功富对我帮助特别大。他精明能干，作战勇敢，威信很高。那时部队没有固定的驻地，可以说红军战士的生活就是在行军打仗中度过的，打到哪里，住到哪里，朝夕相伴的“领导”就是班长。班长是领导，又是兄长；我年纪小，是战士，又是孩子，时时处处都离不开他。班长在我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，他用战士的标准管理我，用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